

郭熙保 著

发展经济学理论与 应用问题研究

FAZHAN JINGJIXUE LILUN
YU YINGYONG WENTI
YANJIU

山西经济出版社

F061.3
312.1

郭熙保 著

发展经济学理论与 应用问题研究

FAZHAN JINGJIXUE LILUN
YU YINGYONG WENTI
YANJIU

HA 327

RA235/64

山西经济出版社

责 编:张慧君
助理责编:刘晓宇
复 审:王宏伟
终 审:赵建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展经济学理论与应用问题研究/郭熙保著.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3. 1

ISBN 7-80636-646-6

I. 发... II. 郭... III. 发展经济学—文集
IV. F06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9456 号

发展经济学理论与应用问题研究

郭熙保 著

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 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红星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5 字数: 428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500 册

*

ISBN 7-80636-646-6

F·601 定价: 3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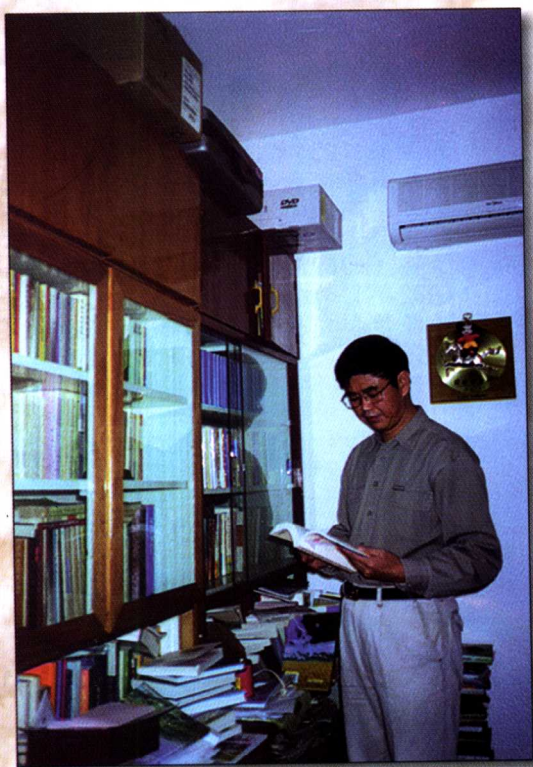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郭熙保, 1954年10月生, 湖北省武穴市人, 经济学博士, 武汉大学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跨世纪人才计划入选者, 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 先后获得经济学学士(1982年)、经济学硕士(1985年)和经济学博士学位(1992年)学位。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主讲西方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课程。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武汉大学商学院发展经济学研究所执行所长, 兼任清华大学双聘教授, 湖北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曾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和英国肯特大学进修访问两年多。已出版各类学术著作(包括合著)10余部, 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多篇。主要学术著作有:《发展经济学》、《当代西方经济说》、《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农业发展论》、《经济发展: 理论与政策》等, 译著有:《增长与发展》、《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经济增长的阶段》、《发展经济学经典论著选》等。学术成果多次获省部级以上奖励, 其中,《农业发展论》获1998年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2002年6月在“发展经济学与中国
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发言



作者书房

前 言

我是1985年留校从教的，到现在已走过了17个春秋。17年时间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从青年时代走到中年时代，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意味着学术上的收获季节，现在该是向培养我关心我的老师和亲友们汇报我的学术成果的时候了。于是，我萌发了整理和结集出版论文集的念头。

我最初是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1987年成为武汉大学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是发展经济学。从此，我开始把研究的重点从西方经济学转到发展经济学。因此，我的研究成果也基本上涉及到两个方面，1989年以前基本上是有关西方经济学方面的，1989年以后主要是发展经济学方面的，相应地，我的论文也分为两集出版，一集是关于西方经济学方面的，一集是关于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虽然我出版了10多本著作（包括合著），但有关自己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基本上作为论文发表了。因此，这两本论文集大体上反映了我17年来的研究状况和学术水平。

我是在长江边上一个水乡长大的，别人是开门见山，我是开门见江，一发大水，必淹无疑。我是在1954年发生的一场特大洪水之后不久出生的，因此，我的名字原来

带有一个“荒”字。父母都是以船为生，目不识丁，我儿时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度过的，这些背景对我的成长是非常不利的。船上生活单调乏味，没有小朋友一起嬉戏玩耍，基本上与世隔绝，父母亲也不可能教我文化知识。后来，到了上学年龄，我母亲为了我读书，不再开船了，我们就开始过上定居生活。我是在农村上的小学和中学，由于书读得早，抢在“文化大革命”前把小学念完了。但是，一进中学就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使我这个从小就喜欢读书的人变得无书可读，实际上，我在上大学之前读的书是非常有限的，举个例子说吧，我在1978年参加高考时有一道历史题叫做“官渡之战”，我对这个战役闻所未闻，不知道是哪朝哪代的，因为我以前从没有见过更不用说读过《三国演义》。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大革文化命的年代，我们这一代学生既要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因此，上课学习有效时间很短，再加上我所读的高中是一所新建的学校，我们几乎天天都要参加劳动，每周固定劳动两天，平时下课时还要上山采石，下山挑砖，不知挑断了多少根扁担，挑破了多少只箩筐。因此，中学时代我们读书很少，举个例子说，我们所学的数学课本是本小册子，只有薄薄的60个页码，很多应该在中学学的数学知识我们都没有学。所以说我们这一代人 都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只是程度有些差别而已，我作为农村的孩子可能算是被耽误得比较多的一类。幸好我的家庭出身比较好，没有被当做专政的对象，这一点

可能比那些受到家庭出身影响的同龄人算是幸运的了。

中学毕业以后，在社会上混了6年时间。期间，我当过农民、小学教师、公社理论辅导员、通讯报道员，也当过工人。我在农村干革命期间也被贫下中农推荐过上大学，但被别人挤掉了，结果大学没上成。正当我上大学的梦想灰飞烟灭时，恢复高考的消息又使我振奋起来，我感觉到我童年时代所做的大学梦终于有望实现了。我彻夜难眠，激动不已，于是，我翻出发黄的中学课本开始复习起来。当时我已经23岁了，这个年龄应该是上研究生的时候，可是，我还得为考大学而奋斗。第一年犯了一个战略性错误，由于井底之蛙，不知天高地厚，鬼使神差地报考了一个英语专业，虽然总分过线了，也被初选了，但最终因英语成绩太低未被录取。第二年改弦易辙，放弃了报考外语专业，高考成绩还算可以，在全县名列文科第二，结果在我刚满24岁时被武汉大学录取了，而且读的是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政治经济学是我多年的夙愿，我在农村期间担任理论辅导员，辅导农村干部和社员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其中有很多涉及到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什么商品二重性、劳动二重性、货币、价值、剩余价值等概念，我都是似懂非懂，但感到很有趣，很想弄懂这些深奥的概念和理论。于是，我报考了政治经济学专业，结果还真的如愿以偿。

我在改革开放初期看了一篇小说叫做《减去十年》，小说从一个传言开始，说中央决定每个人减去10岁，不同年龄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都为之激动不已，盘算着自己

年轻 10 岁时将要干什么。到现在我还经常想着这篇小说所讲的看似荒唐的故事。在我的人生旅程中减去这荒废的 10 年该多好啊，那我就可以读更多的书，出更多的成果。至少把我从高中毕业到上大学之间的这 6 年减去，那我到现在就应做了 23 年学问，而不是现在的 17 年，学术成果肯定要比现在多得多。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失去的永远不会回来了。

但是，加倍努力是对失去时间的最好的补偿办法。由于我们这一代人都或多或少地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因此读书都很用功，几乎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当然，由于我们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上大学的，因此，所学的东西现在在大部分已经过时了，而现在所需要的基础知识，在大学时代学得却不多。例如，西方经济学和数学学得不多，英语也学得很不扎实，而且我们这些大龄学生在中学时代正赶上“反帝反修”，“不学 ABC，同样干革命”，结果英语学得很少，可以说，英语基本上是在大学开始启蒙的，从 ABC 学起。相比而言，现在的年轻人学习环境比我们那个时候要优越得多，基础要好得多。

在读大三时才开始学习西方经济学，虽然课时非常少，学得不多，但是，我们还是大开眼界，第一次知道供给和需求原理还可以用公式和图形表示出来。于是，我对西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决定报考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西方经济学方向研究生。经过两个月没日没夜的紧张复习，终于以平均 80 多分的较高成绩考上了西方经济学方向的研究生。在读研究生期间，结合专业课的学习，我阅

读了一些西方经济学文献，其中，有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这部著作。虽说不过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翻译成中文只有6万字，但是，这本书惜墨如金，晦涩艰深。我当时可谓有点儿知难而上的精神，想啃啃这块骨头，于是，我把评述斯拉法的经济理论作为我的毕业论文主题。我的论文是在我的导师刘涑源教授尤其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胡代光教授指导下完成的。胡教授对斯拉法有较深的研究，所以，刘老师把我的论文委托胡先生指导。在我整个论文写作过程中胡先生对我帮助很大，他不仅为我提供很多珍贵的文献资料，而且对我的论文框架设计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对初稿进行了逐字逐句的修改，指出了我论文中的错误和不当之处，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因此，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倾注了胡先生的许多心血。由于胡老师的悉心指导以及经过我一年多时间锲而不舍的努力，我的硕士论文获得了评阅专家和答辩委员的一致好评，以全优票数通过，该文的主要部分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我发表的几篇有关斯拉法经济理论方面的论文，都是在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我留校任教，在经济系讲授西方经济学课程，我的教学和学术生涯从此便开始了。我在从教的最初几年中写了不少东西，都是有关西方经济和经济学说史方面的。在这期间，我参加了汤在新教授主编的《近代西方经济学史》一书的写作，撰写了维克塞尔累积过程理论和张伯伦与罗宾逊的垄断竞争理论两章；参加了刘涑源教授主编的《凯恩斯主义研究》的写作，撰写

了 IS-LM 模型和后凯恩斯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两章。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还参加了谭崇台教授主编的《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一书的写作,撰写了三章,它们是维克塞尔的累积过程学说、俄林的要素禀赋学说和克拉克的经济进步理论。此外,我应北京大学商德文教授的邀请,为陈岱孙教授主编的《近现代货币与金融理论研究》一书撰写了“瑞典学派货币理论”。以上成果都收集在我的《西方经济学说研究》一书中。

1987 年,我考上了西方经济学专业发展经济学方向的博士生,师从我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谭崇台教授,从此,我的研究方向转到发展经济学,其研究成果大部分收集在我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与应用研究》中。在我开始读博士后不久,谭老师带着我们开始编写发展经济学教材,我被分配的任务是撰写人口流动、农业发展与工业化、人力资源、财政与货币政策等部分。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全身心投入,终于完成了任务,《发展经济学》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出版了。该书 54 万字,我大约撰写了其中的 1/3。该书在国内学术界获得了很高的赞誉,引用率非常高,先后重印了 10 次,并获得了全国优秀教材奖和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实际上,该书既是教材,也是专著,具有较高程度的创新性,其中我撰写的几个部分基本上都在杂志上公开发表了。

在《发展经济学》中农业发展这一部分是我撰写的,因为我对农业发展研究有一定的基础,谭老师要求我博士论文做农业发展方面的。这时,我有一个出国访问的机

会，由于忙于出国前的准备工作，我推迟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和答辩。1990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进修了一年。哈佛大学拥有世界上藏书最多的大学图书馆，在哈佛期间，我听取了一些相关的研究生课程，收集并阅读了大量的有关发展经济学和农业发展研究方面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对我回国后撰写博士论文是极为宝贵的。阅读了这些文献之后，我感觉到思路更为开阔和清晰了。1991年下半年回国后，我着手博士毕业论文的写作，原计划比较宏大，涉及到农业发展很多方面，但由于时间紧迫，我把我的研究题目定在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这个问题上。经过半年多的潜心研究，我的博士论文《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完成了。全文篇幅不长，大约11万字左右，但该论文获得了评阅专家的高度评价，并以全优的票数通过了答辩。这里，我把几位评阅专家的评语摘录如下：

夏振坤教授：“该文不落俗套，有所创新，理论层次较高，观点正确有新意，论证有力，是一篇有较高学术价值和与实践有指导意义的成果。”

陈观烈教授：“作者不从流俗，不迷信权威，不以引证经典字句来代替自己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和表述，充满着辩证法，所以，许多结论便显得坚实可信。”

宋承先教授：“该文选题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于一些长期争论未决的问题，做出了开创性的答案。”

胡代光教授：“该文理论密切联系实际，论证有说服

力，且有一定理论深度，其中有不少新意和创见，许多论点颇有见地。”

彭星间教授：“文章观点鲜明，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结构严谨，论证有力，许多观点具有相当的新意和创见，对平常的问题做出了不平常的分析，使人耳目一新。”

何炼成教授：“本论文立论正确，论证详细，资料翔实，具有新意。文章对过去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异议，表现了作者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言之成理，符合客观实际。”

我的博士论文有些部分在杂志上公开发表了，其中农业对经济发展所做的资本贡献这一部分在1992年第9期《经济研究》上以“我国农业资源转移的规模与特点”为题目发表了，该论文获得了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另外还有4篇论文发表在《经济学家》、《经济学动态》、《江汉论坛》等刊物上。

我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之后，我并没有就博士论文出书，因为我的博士论文只是我农业发展理论研究计划的一部分。由于教学任务比较重，加上要完成另外一些研究任务，我对农业发展问题的研究计划到1994年中期才最终完成。1995年初，我的《农业发展论》一书终于与读者见面了。在该书中，我对博士论文进行了一些补充和修改，博士论文的内容大约占该书的1/3的篇幅。如果从1988年准备博士论文算起，写作《农业发展论》前后花了我大约6年时间。但我对该书并不是十分满意，有些问题还没有涉及到，例如农业经济组织问题涉及得很少；有些问题论述得比较粗糙，例如，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农业发展

的影响这个问题，虽然谈到了，但论述得不够深入透彻。因为当时要赶评职称，时间比较仓促，就把书提前出版了。不过，我对该书是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的，自认为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关于该书的特点和创新之处见本书中有关我的一篇访谈录。

该书的出版得到了学术界很高的评价，引用率是比较高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学动态》等6家报刊对该书发表了书评。该书虽然是一部有关农业方面的学术著作，但出版后不到两年时间就重印了一次，这表明该书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该书被武汉大学出版社推荐作为1996年度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图书奖的候选作品，但是由于有关部门考虑评奖的平衡问题，没有把这本书报送到中宣部，结果还是被湖北省新闻出版局评为湖北省“五个一工程”图书二等奖（评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图书奖的作为一等奖）。但是，在1998年教育部高校第二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奖中经过通讯评审和会议评审，《农业发展论》最终被评为一等奖，这是我没有料想到的。这表明我的专著《农业发展论》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和肯定。

《农业发展论》中的一些章节已作为论文发表了。读者可以看到，本论文集集中有不少农业发展方面的论文，它们大多数是来自该书中的某些章节，当然，其中有些在发表时作了修改和补充。

我1995年再次来到美国，在芝加哥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在芝加哥访问期间，我参加了一个在芝加哥郊区举

行的题为“21 世纪的中国”学术研讨会。在该研究会上，我作了一次题为“迈向 21 世纪：中国的工业化与当前的主要战略”演讲。我利用拉尼斯—费模型估计了中国在 21 世纪中叶将要达到的人均 GNP 以及为达到这一目标将要付出的临界最小努力是多大。在演讲中，我是用汇率折算的美元收入来估计的，当时有人指出用汇率折算的美元收入不能反映中国的实际收入水平，应该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这次研讨会提出的问题对我触动很大。的确，以前也有些国际机构和学者尝试着用购买力平价来估算中国的收入水平，但中国政府未参加联合国的国际比较项目，因此，这些估计都带有非官方性质，估计结果差别很大，从 1000 美元到 3000 美元不等。我到美国两次，生活了两年多，直觉告诉我中美之间的收入差距没有统计数据上反映的那么大，于是，我决定自己对这一问题进行一番研究。这是个需要作大量调查研究的课题，我利用在美国访问研究的机会，收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统计数据，还花了很多时间拿着纸笔亲自到市场上作调查。1996 年下半年回国后，我申请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个客座研究项目，该项目题为：美元对人民币的购买力研究。在 1997 年期间，我差不多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这个项目的研究上，阅读文献、实地调查和收集资料、整理和处理数据花了我整整 1 年时间，几易其稿，最终在 1997 年底拿出了一个 1.8 万字的研究报告，该报告题目是：中美两国货币购买力与收入水平比较分析。该项研究报告以《购买力平价与全国收入水平估计》为题目发表在

1998年第4期的《管理世界》上,该论文获得2000年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二等奖。

从1996年开始,我着手编写一本发展经济学教材。自1987年以来,我一直在讲授发展经济学课程,讲稿年年修改,年年累积,而且以前参加过谭崇台教授主编的《发展经济学》教材的编写,因此,编写一本发展经济学教材应该是件驾轻就熟的事情。但是,对于我来说,每一项工作都觉得不容易,认真和执著是我一贯的治学态度。其实把过去的讲稿稍加修改,很容易就出一本教材,但武汉大学被公认为是我国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基地,教材建设理所当然地要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在全国具有领先水平。我是把编写教材作为一项研究工作来做的,把它作为一本研究性著作来写。经过4年时间的努力,该书终于在1999年下半年完稿,2000年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有趣的是,我对该书的书名也推敲了好长时间。应该说把教材以一个学科的名称命名是一种比较规范的做法,也比较符合我们中国学术传统。但是,我考虑到发展经济学还不是一门很有系统性、规范性的学科,因此,我把教材的书名确定为《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该书出版以来,受到许多高校师生的欢迎,被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武汉大学、江西财经大学、河南财经学院、云南农业大学、清华大学等几十所大学用做财经类本科生教材和研究生参考教材。最近,该书又被重印了。

我在本论文集集中收集的好几篇论文就是来自该书的一些内容。我始终认为,如果你编写教材的一些内容能够

以论文形式发表出来，这说明你的教材就是研究出来的成果，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这是判别研究性教材和一般性教材的主要标准。如果一本教材中的内容没有任何新东西，都是别人讲过的，只是重复别人的劳动，当然，就不可能作为论文发表了。

我最近正在从事一个研究课题，其名称为“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理论与实践研究”，该课题是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基金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作为中间成果，我与我的博士合作，发表了一些有关后发优势方面的论文。这个项目现在还在进行之中，还将陆续有新的成果出来。

在结束这篇自传体前言之前，我要特别提到一篇短文——我在《发展经济学理论与应用研究》论文集中收集了我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小文章，其中有一篇小文章题为《建议取消“国营”的牌子》，该文篇幅特别短，只有400字左右，是我收录的文章中最短的一篇，但我认为，它是非常有意义的一篇，所以，我把它收录到论文集中来了。该文写于1984年，它实际上是我看到中央关于深化企业体制改革的文件后突然产生的一个灵感。我觉得既然企业体制改革目标是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就应该把“国营”的牌子取消，改为“国有”。当时，我把这篇短文投到很多报刊，但因为我是个研究生，一些有影响的大报没有把我的文章发表出来，只有当时武汉地区办的一家小报（可能叫做《中国改革报》）把它发表出来了，不过我没有把这份报纸保留下来。但是，我也把我这篇短文寄到上海一家当时非常有影响的经济学报，虽然该报